

# 清末唐绍仪使美研究

刘冬梅 王丽丽

**[内容提要]** 日俄战争后,为挽救东三省危机,1908年7月,唐绍仪以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使大臣的身份,赴美展开外交活动,力图引进美国资本,设立他筹划的东三省银行,开发东三省资源,并就已在传说中的中、美、德联盟问题作进一步的试探。不料,美日《罗脱-高平协定》的签署,慈禧太后的离世,宣告唐绍仪使美功败垂成。通过对唐绍仪使美运作过程及其失败原因的研究,表明富有成效的外交必须以充满活力的内政为基础。

**[关键词]** 清末 东北地方政府 唐绍仪 联美制日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241 (2016) 01 - 0074 - 06

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16.01.011

1908年7月,唐绍仪以致谢美国退还庚款的专使大臣的身份,赶赴美国展开外交活动,力图引进美国资本设立他筹划的东三省银行(利用美国减收的庚款作抵押),开发东三省资源,增强对抗日本的力量,并就已在传说中的中、美、德联盟问题,作进一步的试探。

## 一、唐绍仪使美背景

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决定一出,美国驻奉天总领事W·D·司戴德便向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建议,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东三省银行并发展东北产业。为使这一计划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司戴德于1907年11月18日到了海参崴,向正在远东考察的美国陆军部长威廉·哈伍德·塔夫脱介绍了东北的局势,详细讲解了东三省银行计划,并请求他帮忙说服美国政府同意把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东北的经济发展。司戴德认为,这是“加强美国在东北利益”的“一个难得的机会”<sup>①</sup>。一年半后入主白宫的塔夫脱很感兴趣,他对此计划表示“欢迎”,并

向司戴德保证,“罗脱和罗斯福将会给这个计划以有利的考虑”<sup>②</sup>。

1908年3月,唐绍仪奉命晋京襄办外交和磋商出使美国的事宜。唐绍仪出发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盛京召集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巡抚举行会议,讨论利用退还庚款事宜及唐绍仪晋京争取清廷和袁世凯支持联美制日、开发东北计划的问题,会议还通过了由奉天巡抚唐绍仪提出的利用退还的款项作抵押的东三省贷款计划。

一个偶发的外交事件将司戴德推下了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座椅。一直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的司戴德触怒了日本。日本人不断毁损美国领事馆的过往信件,并到领事馆前滋事闹事,终于酿成了“奉天事件”:日本邮差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的门卫发生纠纷,欲强行闯入领馆,被推出门外后,又找来四个同伙,再次闯进领事馆,甚至闯入司戴德的卧室。领事馆的人员逮捕了这五个人,并把他们扭送到日本驻奉天领事馆。<sup>③</sup>事件发生后,司戴德在给北京的宣传局长乔治·马文的信中“诙谐地描述”了事件的过程。随即马文

**[作者简介]** 刘冬梅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海南 海口 570228

王丽丽 吉林大学图书馆馆员 吉林 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 海南大学国学与海南历史文化项目(ZXBJH-XK028)

在天津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叙述“奉天事件”的“生动的通讯”，引来美国各报的转载，导致美国国务院来电催司戴德尽早回国，结束了他为期两年的驻奉天总领事的使命。

司戴德离职了，唐绍仪却迈出了联美制日的脚步。他到北京后，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奏称，“近日较前益形棘手，惟有内固民智，外保邦交，设法挽回”，又“力主借外债兴海军”<sup>④</sup>。兴海军之议遭罢议，而外保邦交——主要是联美制日之议则得到了支持。1908年4月，袁世凯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了对美国的好感和对美国给予中国外交支持的迫切希望，他说：“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击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sup>⑤</sup> 这番话表明了清廷对联美的期待。

19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削减清政府庚子赔款数额的法案。1908年7月18日，清政府宣布上谕：“美国与中国立约以来，邦交素笃，此次减收赔款，征征友谊敦睦，尤宜遣使致谢，用酬嘉意，奉天巡抚唐绍仪著加尚书衔，派充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sup>⑥</sup> 7月20日，清政府再命专使大臣奉天巡抚唐绍仪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诸大国，“将诸国经理财政办法详细调查”<sup>⑦</sup>。另据郑砺石《唐绍仪生平二三事》载，唐绍仪取道日本赴美，还有一个特别任务：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进行革命活动，留日学生纷纷响应，并出版《民报》等刊物鼓吹革命，革命刊物在国内大受欢迎，清政府却畏之如毒蛇猛兽，因此特命唐绍仪取道日本，请求日本政府禁止这些革命刊物的出版，并“许以多项交换条件”<sup>⑧</sup>。总之，唐绍仪使美的目的是与美直接磋商借款开发东北等事宜，并通过这种经济手段达到与美接近直至建立中美联盟的政治目的。而兼充考察财政大臣的名义，使唐绍仪可名正言顺地前往柏林与德国联络，以探讨德国所提议的中、美、德三国同盟的可能性。德国驻中国公使雷克司当时即向柏林报告说：“唐绍仪已经机密地谈起他赴美的使命。道谢美国退还赔款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为

接近德美铺平道路……唐请我通知帝国驻华盛顿大使，他将考察问题专使名义取道欧洲返国。”<sup>⑨</sup>

这是20世纪初以来在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逐步高涨的形势下，被逼上改革道路的清政府意欲振作的一个举措，也表明了清政府走出外交困境的愿望。但是，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退还减免庚款计划，作为金融和外交上的一项计策，在中国对于解决满洲问题，像司戴德和唐绍仪所解释的那样，有着根本意义。后者看到，中国被列强间订立的种种条约、协定层层包围了。司戴德也同样觉察到前景黯淡，特别是在日本干预的地区；然而他还有在满洲建立一种坚实的经济势力，使之与他理想中的美国在华作用相称的另外难题。庚款问题是扭转满洲和中国事态趋向的一种手段；但由于是一个孤立的工具，它过于单薄了。更多的工具势所必需，司戴德要利用它们。”<sup>⑩</sup> 司戴德曾告诫唐绍仪说，“我们美国人首先是商人”，他们坚持任何金融业务都“必须以尽可能具体的形式提出”，劝说唐绍仪向美国金融界提供实质性的东西。<sup>⑪</sup> 离开奉天的前夕，他与唐绍仪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以一笔二千万美元的贷款成立作为东三省地方当局财务代理的银行，该银行的任务是稳定东北的金融、开发东北的农矿森林、在东北进行铁路投资等，以退还的庚款和中华帝国的担保来保证这一贷款。”两个人还草拟了几个初步方案，其中包括从俄国收购中东铁路以及修筑一条由齐齐哈尔到瑛珲的铁路的计划，这份草签合同为唐绍仪赴美铺平了道路。1908年10月3日，唐氏一行从上海乘船启程，先往日本，之后再赴美国。

## 二、唐绍仪使美失败原因

### (一) 美国对日绥靖政策

此次唐绍仪美国之行，国内舆论极其乐观，但是日本绝不会坐视中美联盟的实现，而美国的远东政策也仍然将日本摆在优先地位，因而，日美谅解的可能性就大大高于中美联盟的可能性，联美计划的胜算其实是极低的。<sup>⑫</sup>

司戴德认为美国对日本态度不强硬的原因是美国的大资本利益没有卷入到中国东北中来，因

此,他设法让美国大资本家或者政府向中国东北投资。他向哈里曼通报了他同唐绍仪签订的协议的内容。<sup>③</sup>哈里曼立即让坤洛公司同司戴德就贷款问题进行讨论。1908年11月2日,坤洛公司代理人希夫(Jacob H.Schiff)和国务院远东司代理司长奥托·昆恩(Otto Kuhn)通知司戴德,他们准备根据司戴德和唐绍仪签的协议为基础,考虑向中国东北贷款的问题,并表示愿意就此问题同唐绍仪谈判。为获得美国政府的切实支持,司戴德到华盛顿向国务卿罗脱详细介绍了同唐绍仪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但此时,罗脱正与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举行会谈。由于此时罗斯福政府所执行的是对日绥靖政策,罗脱无意采取同日敌对或会遭到日本反对的政策,因此,他不打算支持司戴德同唐绍仪的协议,又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对司戴德说,他不反对该协议的内容,但是希望不要使日本产生这种印象,即哈里曼或中国方面在履行该协议时,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这实际已经公开向司戴德讲明,美国政府不会出面支持这个协议。<sup>④</sup>

另外,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从一开始就反对司戴德把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东北经济的计划,主张把这笔钱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可以推动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商业进步,因此使中国成为一个美国的更为理想、更为富裕的“贸易伙伴”。同时,受美国教育的北京领导人将给美国以“空前的影响”<sup>⑤</sup>。“从长远的观点看,把赔款余额用于教育”,比用于“满洲银行计划有价值得多”<sup>⑥</sup>。柔克义哀叹中国的借贷史,指出中国人对于金融问题所知甚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信用,靠临时权宜的、缺乏保险的财政计划来度日。他在随后致美国国务院的信中,仍对东三省银行计划持反对态度,并提醒国务院注意唐绍仪计划的政治含意。柔克义还在五、六、七三个月连续三次向清政府发出警告,如不接受美国的决定,中国则有可能得不到赔款余额。<sup>⑦</sup>清政府担心美国翻改原意,外务大臣奕劻复函柔克义,表示将把退款用于派送学生赴美留学。<sup>⑧</sup>柔克义也反对美国舰队访问中国,他认为那样将是对唐绍仪联美计划的变相支持。结果,美国舰队大张旗鼓地访问日本之后,只派出几只舰艇对厦门进行了小规模访问。同时,

在日美就远东问题的协商中,罗脱承诺:“美中之间绝不会有同盟关系。”<sup>⑨</sup>

美国政府的消极态度当然不是好兆头,但对联美制日政策根本的一击则来自于日本对美国纵横捭阖的外交成果——《罗脱-高平协定》。

## (二)日本的外交阴谋

唐绍仪于1908年10月11日到达东京,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乘机向唐绍仪宣讲了一通远东大势,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度过几次瓜分危机而安然无恙,实在是靠了日本及其盟友英国;清政府如若希望这种和平状态继续下去,就应该与日本改善关系,互相提携。他还警告说,现在有的国家正在制造矛盾,挑拨中日关系,希望清政府不要上当。”<sup>⑩</sup>但唐绍仪与日本外相小村关于新法铁路问题的会谈则未获得任何协议。重要的是,日本拖延时间的阴谋已经达到。就在唐绍仪滞留日本的20多天里,日本对美国的外交取得了迅速进展。早在1908年7月21日,“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从“满铁”的报告中得知唐绍仪使美的消息后,致函陆相寺内正毅,要求内阁注意唐绍仪访美的使命,<sup>⑪</sup>而小村外相则即刻训令日本驻美国公使高平小五郎就“太平洋问题在适当时机与美国达成协议”<sup>⑫</sup>。

就这样,日本迅速展开了先发制人的外交攻势:一方面要抢在唐抵美之前与美改善关系并达成协议,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唐绍仪即将访美之际,日本军警便开始在中朝边境地区大肆活动,在延吉地区设立分遣所,增派宪兵。1908年10月中旬,日军开枪毙伤中国警兵。10月末,日本人在图们江上架桥,并派兵保护。这一系列频繁的军事行动,是要赶在中美接触之前更多地造成在“南满”扩张势力的既成事实并表明其强硬态度,即日本不会因中美同盟而改变在东北的独霸政策,既向中国施压,又要美国慎重处理中美同盟问题。果然,日军的军事挑衅令清政府紧张,除指令徐世昌“克制”、“严加交涉,勿轻用武力、堕其奸计为要”外,外务部连电已到日本的唐绍仪,令其速向日政府开议有关问题,“俾得早日解决,免致滋生事变”<sup>⑬</sup>。这样,日本不仅成功地迫使唐绍仪坐下来谈判,在唐绍仪到达美国之前确定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同时也争取到时间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命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再向美国建议谈判缔结日美条约。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日本对美国的排日风潮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对于日美间的军事紧张局势,亦进行了遏制和化解。当时,美国舰队正开往太平洋,美国朝野上下都大肆宣扬美舰出航是对日本的“警告”。对此,日本政府却表现出罕见的克制态度,主动地邀请美国舰队在航行途中顺便访日,以示友好,并趁机炫耀自己的力量,结果使罗斯福总统发现美国远东舰队“在战争实力上,远逊于日本舰队”,并担心中、美、德结盟会激励中国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导致另一场中日战争。这使罗斯福意识到维护美国在远东利益的最好办法是与日本建立“和平”关系,因而在远东积极谋求与日本妥协。出于这样的顾虑,美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谈判缔约建议,于是中、美、德三国同盟的舆论一变而为日、美、英三国同盟之事实。日本成功地化解了与美国的矛盾,事实上已经赢得了中日间争取美国支持的关键一役。<sup>②</sup>

日美谈判的结果,是在1908年11月30日,即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的当天,正式宣布了双方广泛性谅解的《罗脱-高平协定》。日美双方申明:两国政府均愿在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平地发展商务事业;在该区维持现有的状态,互相尊重各国在该区域之领属等。美国政府既然在换文中公开承认维持远东“现状”,也就不便大规模地对华借款,以及商议中美同盟等事宜。显然,这是日本政府利用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反对美国资本家在东北经济活动的一次胜利。这对唐绍仪苦心经营了两年的联美制日计划无异于致命的打击。

日本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改善了日美关系,说明美国的远东政策仍将日本摆在优先的地位。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当时美国重要的决策人物都认为不应冒损害美日关系的风险去插手中国事务,尤其是当日本作出姿态,谋求改善美日关系的时候。虽然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危害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中日之间,罗斯福总统偏见地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他说:“要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同种,那多么荒唐可笑啊!”<sup>③</sup> 这种观点在美国政界是有代表性的,它

制约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 (三)国内政局变幻

唐绍仪使美命运多舛。在外交局面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政局风云突变。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慈禧太后的逝世使袁世凯失去了主要的支持者,面对着强有力的亲日派以及痛恨他的摄政王,袁世凯自身难保,再无力支持唐绍仪。国内的变故令唐绍仪极为担忧,那时他刚抵达旧金山几个小时。

如果说日美的谅解是唐绍仪联美制日外交失败的外因,那么清朝最高权力的交替则是其失败的內因。1909年1月初,支持唐绍仪访美的袁世凯被开缺回籍,而唐绍仪在“政治上之备受重用,与袁世凯的关系最为密切,实际为晚清北洋大臣袁世凯权力扩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唐氏的权位上升只是袁世凯权力政治的一环,所有唐氏在晚清对外交涉与铁路行政所处的枢要地位,均可视之为袁氏在此方面的代理人,而唐绍仪个人在政坛上的升黜荣枯,也可表示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权力集团在晚清政局中的扩展与退缩”<sup>④</sup>。

20世纪初的清王朝,虽然已有外务部之设,但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没有一种与时代相符的机制,而是与19世纪末相似,依然是由统治集团中权势最重的官员或派别提出,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而非举朝一致,亦少连续性。因而朝内的派系斗争、政局转换、重大的人事变动,都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所谓联美制日,其核心鼓吹者为袁(世凯)系官员,尤其以在东北任封疆的几位大吏态度积极,且得到了晚清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支持。新的执政者显然因为戊戌旧恨不喜欢袁世凯,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袁世凯在新政的几年中利用把持的权力已使自己的权力膨胀到了满清贵族不能容忍的程度。如果联美政策成功,袁世凯的命运或可有转机,但是1908年11月30日到达华盛顿的唐绍仪在12月2日只受到罗斯福总统礼仪性的接见,虽也与国务卿罗脱会了面,可会谈中罗脱严守对日本人的许诺,不与清政府建立任何超乎寻常的政治关系,并且阻挠将退还的庚款用于东北,包括用作银行保证金。唐绍仪介绍了

清政府在东北面临的形势及与日本官员在东京会谈的情形,并提及有关中国与美德结盟的传闻,对此,罗脱不作任何评论。罗脱只是对唐绍仪提出的各种纯经济性的计划表示了欢迎。而此时的塔夫脱由于正在寻求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能同罗斯福的政策相左,就推掉了此事。因此,司戴德用塔夫脱为杠杆推动美国政府同意的计划也没有取得成效。而且领事局局长也指示司戴德,“不要进一步过问此事”<sup>②</sup>。

在司戴德的介绍下,唐绍仪接触了一些美国资本家,就东三省银行计划和收购东清铁路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无法取得具体的成果。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了要求美国财政援助的建议。在司戴德的协助下,美国首次对中国对于大量贷款的需求给予了关注。总的贷款计划的建议引起美国国务院的积极反应,因为在美国看来,这个建议完全符合1903年10月《中美商约》和1902年《英中商约》的宗旨。罗脱又会见了唐绍仪,唐绍仪表示,中国打算取消厘金、提高关税、修改矿务章程,并拟建立金本位币制,提出中国约需“二亿至三亿美元”,如果再加上从提高关税中增收的税款,便可以对完成改革有所帮助。<sup>③</sup> 罗脱赞同这一贷款计划,认为这是一件有条约依据的事,符合美国所确立的在华政策。在司戴德看来,坤洛公司承办东三省银行贷款的道路已经打通。但是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却使谈判无法进行下去。

袁世凯被免职后,清政府又宣布唐绍仪的使命不被新政府认可,其出使美国之事,被指为“出自项城(袁世凯)一人之意”,是“项城擅授意唐使订结中美同盟条约”<sup>④</sup>。清廷甚至连电唐绍仪立即回国,并宣布停发使团经费。尽管美国政府正式把唐绍仪介绍给了美国银行家,并授权司戴德从中撮合赞助,但由唐绍仪经手谋求借款已无从谈起,其赴美的目的基本上落空了。

尽管美国政府认为《罗脱-高平协定》的签订是日本重新确认“门户开放”政策而把该协定吹嘘为美国外交的胜利,但实际上这是美国对日本的让步,因为美国承认了它过去不承认的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在远东所获得的权利。虽然该协定暂时缓和了美日矛盾,但大部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此大为不满,称之为罗斯福“外交上的愚蠢”<sup>⑤</sup>。显

然,美国铁路垄断资本集团急于向远东寻找出路,扩大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以摆脱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然而,当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都少得可怜,与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尤其是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也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尤其是洛克菲勒财团,对罗斯福实行与日本妥协的远东政策极为不满,竭力主张在远东与日本展开争夺,以保护和扩大他们在中国的权益。

查尔斯·威维尔说,“唐的出使基本上不算失败。尽管罗斯福政府对司戴德所鼓吹的在满洲反对日本的政策表示冷淡,但国务院通过鼓励贷款谈判,建立了一个对美国经济界进入满洲和向日本挑战的有利环境。司戴德已经达到他促使美国资本充分进入满洲这一角逐场的主要目的。唐绍仪的被召回只是一次暂时的失败,司戴德要着手给美国向远东的推进增添更进一步的推动力。”<sup>⑥</sup>

唐绍仪使美曾试图有所作为,而终无所作为,这一过程也说明真正富有成效之外交必以充满活力之内政为基础。

#### [注 释]

①② Straight, memo, 23, November, 1907. NA, RG59:2413/93.

③ Herbert Croly, Willard Straight, *The Macmilland Company*, 1924, p. 258.

④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五月廿七日。

⑤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145页。

⑥ 《谕派唐绍仪使美致谢减收赔款事》,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三),卷21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289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外务部·中美关系·财政金融》第3482号。

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广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年,第173-174页。

⑨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49页。

⑩⑪ [美]查尔斯·威维尔著,张玮瑛、李丹阳译:《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9页,第63-64页。

⑪ Straight to TangShaoyi ,11, August, 1908. Straight papers ,Olin Library, Cornell University.

⑫⑬⑭ 张晓辉、苏苑:《唐绍仪传》,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96页,第99-100页,第98页。

⑮ Herbert Croly, Willard Straight, *The Macmilland Company*, 1924, p.271.

⑯ Herbert Croly, Willard Straight, *The Macmilland Company*, 1924, p.274.

⑰ Micheal H.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895-1911*,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71.

⑱ Rockhill to Phillips, August 1908, NF2413/148.

⑲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Vol.31.No.3, 1972, p.555.

⑳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8, p.72.

㉑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41卷,第1册,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60年,第696-697页,第75页。

㉒ 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东京:原书房,1981年,第76页。

㉓ 珠海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编:《唐绍仪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7-78页。

㉔ [美]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1-162页。

㉕ 李恩涵:《唐绍仪与晚清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3年,第55页。

㉖ Wilbur J carr to Straight ,10, February, 1908. NA, RG59:2413/92\_94.

㉗ Tang Shaoyi talks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9, December, 1908 ,NA, RG59:2413/218.

㉘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廿一日、廿四日。

㉙ [苏]B·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1页。

责任编辑:刘毅